



【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 】



冷文娜 编著 霍大清 摄影
YINZHANG JUAN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 】

印章



YINZHANG JUAN

冷文娜 编著

霍大清 摄影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周 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 印章卷 / 冷文娜编著;
霍大清摄.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14-8114-1

I. ①四… II. ①冷… ②霍… III. ①博物馆—历史
文物—成都市—图集②古印(考古)—成都市—图集
IV. ①K872.711.2②K87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0194 号

书名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印章卷

编 著	冷文娜
摄 影	霍大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114-1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 mm×260 mm
印 张	14.5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丛书总序

霍巍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为建立于1914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是博物馆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早期建立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中国高校中第一座博物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馆藏文物，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四川大学博物馆现收藏文物5万余套、8万多件，门类包括书画、陶瓷、钱币、刺绣、民族民俗文物等，不仅是教学、科研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学校建设和社会服务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建馆一百周年和四川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组织馆内专业人员编写了这套“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丛书，旨在通过系统的分类介绍与研究，深入浅出，用生动通俗的文字配以精美的文物图片，向广大读者展示馆藏文物精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入选本套丛书的馆藏文物，许多都是国家一二级文物，甚至有不少是国宝级文物。它们凝聚着不同历史时代丰富的信息，从不同的侧面映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也反映出中国西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大多是训练有素、视野开阔的专家学者，他们往往在征集、收藏这些文物的同时，在当地也开展了相关的科学调查与研究，对其文化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例如，本馆所藏20世纪3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玉石器，就是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不仅有完整的田野考古发掘记录，而且还经过葛维汉（D.C.Graham）（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郑德坤等海内外著名学者的初步研究，为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考古的重大发现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三星堆的早期考古工作，被郭沫若先生誉为“华西考古的先锋”。又如，本馆所藏成都皮影精品，来自清末民初一个名叫“春乐园”的皮影戏班。独具眼光的前辈们不仅收藏了这个戏班珍贵的皮

影，同时还将制作皮影的全套工具、数百份皮影戏唱本悉数加以征集，形成可供后世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成都皮影藏品系列，其价值自然远在单件皮影之上。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基于这样深厚的学术背景，本馆的各类文物的收藏就某种意义而言见证了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早期发展的历程，也见证了四川大学这所百年名校对于构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本套丛书的撰著者均为四川大学培养的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和艺术史等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对母校和博物馆怀有深厚的感情，接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术业各有专攻。这套丛书的编写，既是他们献给百年馆庆最好的一份礼物，也是博物馆为四川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献上的一份厚礼。我深信，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不仅可以“透物见人”，回顾四川大学博物馆这座百年名馆的光辉历史，而且可以在我们的导引下步入这座号称“古来华西第一馆”的庄严殿堂，感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灿烂的时代风采，感受一个充满前贤智慧结晶的奇妙世界，体验一次令您终生难忘的博物馆之旅。

是为序。

目录

概述	1
图录	
第一部分：历代官印	8
一、官印	8
【图1】“军曲侯印”铜印	8
【图2】“苏城亭侯”铜印	9
【图3】“落索司马”铜印	10
【图4】“军司马印”铜印	11
【图5】“大中大夫”铜印	12
【图6】“关内侯印”铜印	13
【图7】“汉叟邑长”铜印	14
【图8】“假司马印”铜印	15
【图9】“方俗司马”铜印	16
【图10】“宣阳唯印”铜印	17
【图11】“部曲将印”铜印	18
【图12】“部曲督印”铜印	19
【图13】“殿中司马”铜印	20
【图14】“别部司马”铜印	21
【图15】“军假侯印”铜印	22
【图16】“晋归义叟王”铜印	23
【图17】“晋率善叟佰长”铜印	24
【图18】“晋归义氏王”铜印	26
【图19】“水寨税务之记”铜印	28
【图20】“彭州军资库新本记”铜印	29
【图21】“剑南东川节度使印”铜印	30
【图22】“宣毅第四十一指挥第五都朱记”铜印	31

【图23】“滑州监州西埽物料场铜朱记”铜印	32
【图24】“武宁第八指挥第四都朱记”铜印	33
【图25】“彭州审记院信”铜印	34
【图26】“嘉定利州驻节千户左军步军第四将印”铜印	35
【图27】“义军弹压之印”铜印	36
【图28】“济南府合同”铜印	37
【图29】“书画局关防记”铜印	38
【图30】“熙秦路第十三副将印”铜印	39
【图31】“张仓镇商酒盐场记”铜印	40
【图32】“都统所印”铜印	41
【图33】“行军万户之印”铜印	42
【图34】“提控之印”铜印	43
【图35】“副统之印”铜印	44
【图36】“分治汾州录事司印”铜印	45
【图37】“章翊侍卫亲军百户印”铜印	46
【图38】“管军万户府印”铜印	47
【图39】“宁川卫右千户所百户印”铜印	48
【图40】“定州卫右千户所百户印”铜印	49
【图41】“高县医学记”铜印	50
【图42】“水田长官司印”铜印	51
【图43】“都纲之印”铜印	52
【图44】“巴旺宣慰司印”铜印	53
【图45】“四川达州营游击关防”铜印	54
【图46】“四川理事同知关防”铜印	55
【图47】“四川懋功协副将之关防”铜印	56
【图48】“四川懋功协副将中军都司之关防”铜印	57
【图49】“瓦迷峒陇长官司印”铜印	58
【图50】“霍耳咱安抚司之印”铜印	59
【图51】“四川泸宁营守备之条记”铜印	60
【图52】“四川提标峨边镇远营都司佾书之关防”铜印	61
【图53】“镇守四川松潘等处总兵官之关防”铜印	62
【图54】“温江县印”铜印	63
二、封泥	64
【图55】“右司徒”封泥	64
【图56】“雁门太守”封泥	64

【图57】“关内侯印”封泥	65
【图58】“齐武库丞”封泥	65
【图59】“武库中丞”封泥	66
【图60】“齐宦者丞”封泥	66
【图61】“大司马印章”封泥	67
【图62】“昌邑侯印”封泥	67
三、学印	68
【图63】“祺州州学朱记”铜印	68
【图64】“铜梁县安居乡儒学之记”铜印	69
【图65】“双流县儒学记”铜印	70
【图66】“绵州儒学之记”铜印	71
【图67】“芦山县儒学记”铜印	72
【图68】“下川南区省视学之图记”木印	73
【图69】“川东区省视学图记”木印	74
【图70】“南江县劝学所图记”木印	75
【图71】“什邡县劝学所图记”木印	76
【图72】“绵州劝学所之图记”木印	77
【图73】“西昌县劝学所图记”木印	78
【图74】“古宋县劝学所图记”木印	79
【图75】“天全州劝学所图记”木印	80
【图76】“眉州劝学所之图记”木印	81
【图77】“双流县劝学所图记”木印	82
【图78】“成都府中学堂图记”木印	83
【图79】“安岳县劝学所之钤记”木印	84
【图80】“绵州劝学所之钤记”木印	85
【图81】“重庆府劝学所之钤记”木印	86
【图82】“新繁县劝学所之图记”木印	87
【图83】“酆都县学务科钤记”木印	88
【图84】“梁山县学务科之图记”木印	89
【图85】“秀山县劝学所图记”木印	90
【图86】“峨眉县教育公会图记”木印	91
【图87】“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关防”木印	92
【图88】“合州劝学所之钤记”木印	93
【图89】“大足县劝学所钤记”木印	94
【图90】“保宁府劝学所之钤记”木印	95

【图91】“单级教讲演员养成所”木印	96
第二部分：历代私印	97
一、姓名印	97
【图92】“郭纘”铜印	97
【图93】“王龙”铜印	98
【图94】“杨奂”铜印	99
【图95】“李广”铜印	100
【图96】“赵善积印”铜印	101
【图97】“张刚印信”铜印	103
【图98】“榘仓私印”铜印	105
【图99】“崔山私印”铜印	108
【图100】“李少卿”银印	109
【图101】“韩安国”铜印	110
【图102】“王贺私印”铜印	111
【图103】“杨官印”铜印	113
【图104】“李忠私印”铜印	114
【图105】“秦孝夫”玉印	116
【图106】“卫班印信”铜印	117
【图107】“刘京言事”铜印	119
【图108】“杨廉”铜印	121
【图109】“韩绩”铜印	123
【图110】“陆焯”铜印	124
【图111】“范隆”六面铜印	125
【图112】“熙载”铜印	126
【图113】“董申”铜印	127
【图114】“私印”铜印	128
【图115】“任吉羊”铜印	129
【图116】“关西子明”铜印	130
【图117】“兰氏”玉印	131
【图118】“中华余印”玉印	132
二、斋馆印	133
【图119】“陶斋”铜印	133
【图120】“简斋”玉印	134
【图121】“寿石斋”木印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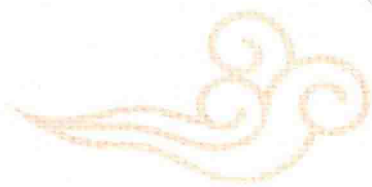
【图122】“寿石斋图书”木印	135
【图123】“峰花翠人书室”水晶印	136
三、署押印	138
【图124】“马”字铜押印	138
【图125】“贵”字铜押印	139
【图126】“姜”字铜押印	140
【图127】“宋”字铜押印	141
四、图文印	142
【图128】巴蜀图语符号铜印	142
【图129】巴蜀图语符号铜印	143
【图130】巴蜀图语符号铜印	144
【图131】巴蜀图语符号铜印	145
【图132】兔图形铜印	146
【图133】虎图形铜印	147
五、宗教法印	148
【图134】“佛法僧宝”铜印	148
【图135】“雷霆都司北极驱邪”铜印	149
【图136】“北极驱邪院印”铜印	150
【图137】“秽迹大明王普摄院印”铜印	151
【图138】“承绩广惠显英之印”铜印	152
【图139】“本竹治印”铜印	153
【图140】“秉教加持之印”铜印	154
六、词句印	156
【图141】铜套印	156
【图142】铜套印	169
【图143】“剑胆琴心”象牙印	182
【图144】“群居守口独坐防心”木印	184
【图145】“虚其心实其腹”木印	185
【图146】百“寿”木印	185
【图147】“焚香扫榻枕书入眠”木印	186
【图148】“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木印	186
【图149】“恭则寿”木印	187
【图150】“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木印	188
【图151】“吉金乐石永保年寿”木印	189
【图152】“才与不才”木印	190

【图153】“近来情转深”木印	191
【图154】“貽福惠君”木印	192
【图155】“爱读生平未见书”木印	193
【图156】“洒砚焚香”木印	194
【图157】“寿命延长至八千岁”木印	195
【图158】“多福多寿多男”木印	196
【图159】“我心安得与石顽”木印	197
【图160】“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木印	198
【图161】“山气日夕佳”木印	199
【图162】“饮且食兮寿而康”木印	200
【图163】“读有用书行无愧事”木印	201
【图164】“万福无极”木印	202
【图165】“家在云门山里”木印	203
【图166】“淑身涉世学古服官”木印	204
【图167】“我本薄德人宜行积德事我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木印	205
【图168】“仁者寿”木印	206
【图169】“延年益寿”木印	207
【图170】“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木印	208
【图171】“诗书裕后孝友传家”木印	209
【图172】“调养怒中气隄防顺口言留心忙里错珍惜有时钱”木印	210
【图173】“故能若是之寿”木印	211
【图174】“陋室铭”木印	212
【图175】“胡拆富贵长寿之印”木印	213
【图176】“作德心逸日休”木印	214
【图177】“云门山樵”木印	215
【图178】“以义理为丰年以忠恕为珍宝”木印	216
【图179】“富贵寿考”木印	217
【图180】“为善最乐”木印	218
【图181】“积庆”水晶印	219







参考文献	220
------	-----

概 述

GAISHU



印章是一种印于文件上的用于取信的工具。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印章一直紧密地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宗教、艺术等相结合。关于中国印章的起源，或说商代，或说周代，至今尚无定论。根据存世遗物和史书记载，印章至少在春秋时已出现，战国时已普遍使用。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后来发展成为身份凭证和行使职权的工具，再后来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品。除日常公私应用外，印章多用于书画题识，因多用篆文刻成，故雕刻印章又称“篆刻”，与书法、绘画相提并论，称为“金石书画”。

“印”字，甲骨文作，像一只手（爪）抓住一个跪着的人的头部，表示用手按住人使之跪拜，其本义为古代官府强制性地发配边疆的罪犯额上烙戳发配记号。“印”字在周末演变为以爪执节之形，金文作“”，篆文作，词义也发生变化，按《说文解字》：“印，执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卂。凡印之属皆从印。”^①指执政者所持的信物，其作用是使官府文书具有权威性并使所封之物得以远传。“印”的“压制”本义消失，篆文另加“手”再造“抑”字代替。

通常印章由印钮和印面组成。印钮是印章顶部用于系带或装饰的突起，也称印鼻或印首。印钮最初的作用是方便将印章系佩于身，上有孔可以穿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的需要。印面是刻印文的地方，用于镌刻文字或图案，供撒印之用，其四周的侧面也可能镌刻文字，如姓名、年月等，称为款识或题跋。

印章的材质有玉、金、银、铜、铁、木、石、牙、角、水晶等。根据不同的材质，印章的制作方法大致有铸造和凿刻两种。铸造法一般用于制作金属印章，通常先刻蜡模，用黏土作范于模之四周，熔金属浇注入泥范而成，故也有将铸印称为“拨蜡”的。其余材质的印章多用凿刻法，即在预制的印坯上用刀凿刻印文。金属印章也有先铸印坯，后刻凿印文的，称为“急就章”。

印章的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

别。印章文字或图像凹下的通称阴文，沾印泥钤盖出来的效果是印底呈红色，文字呈白色，故又称白文。白文印色泽以白色居多，给人空旷、宽敞、愉快的感觉。印章文字或图像凸起的通称阳文，钤盖后印底呈白色，文字呈红色，又称朱文。朱文印印文色泽鲜红，给人醒目的感觉。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印章380枚（套），其中包括封泥20枚。年代上起战国，下迄近代，材质有铜、银、铁、木、石、牙、玉、水晶、塑料等，门类丰富。总的来看，该馆所藏印章，可以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种，官印是官方的印章，私印则可包括除官印外的所有其他印章。

历代官印各有其制度，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封建官僚制度后，印章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名称、形制、印文、使用方法上均各有不同。

在名称上，各个历史时期，官印有过众多的别称。春秋战国时期，官印统称为“玺”或“玺节”。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规定只有天子印才可称“玺”。唐武则天执政后，因恶“玺”音同“死”，下令改“玺”为“宝”，此后“宝”作为皇帝之印的专用名称，一直沿用到清代。其余百官印则有“印”“章”“记”“朱记”“关防”“图记”等多种称谓。汉魏时，普通官印称“印”，列将军之印称“章”。如【图1】“军曲侯印”铜印、【图61】“大司马印章”封泥。隋唐时又新出现“记”与“朱记”的称谓，但在唐代这种用法还不多见，到宋代才被广泛地用于下级官吏的印中，如【图20】“彭州军资库新本记”铜印、【图24】“武宁第八指挥第四都朱记”铜印。明代出现了一种长方形的官印，称为“关防”，沿用至清，如【图46】“四川理事同知关防”铜印。清代又新出现“条记”“图记”“钤记”等，多用于下级官吏的印中，如【图51】“四川泸宁管守备之条记”铜印、【图72】“绵州劝学所之图记”木印。

在形制上，历代官印在材质、大小、钮式上均有区别。

官印材质以铜为主，另有金印、银印、铁印、木印等。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历代官印多为铜印，也有部分清代下级官员的印为木印。

^①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187页，中华书局，1963。

隋唐以前的官印体积较小，一般边长在1.5~2厘米左右，约合秦汉一寸。此时官印随身携带，在印钮上有一个细小的穿孔，按照不同的官阶，佩带不同颜色的绶带——印绶有紫绶、青绶、墨绶、黄绶的区别。隋以后，官印尺寸猛然增大到5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增大，官印不再像秦汉时期那样镌刻职官名而发给官吏本人，而是转为发给该官吏所在的官署；官印也不再佩带，而是变为匣装，置诸衙署。同时，由于印章不再封泥而是转为钤于纸帛，印泥（一般为红色）出现了。而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官印也由秦汉时期的阴文转为阳文。

汉魏官印钮式丰富，有鼻钮、龟钮、羊钮、驼钮等。鼻钮是印章中最常见的一种钮，以其孔小如鼻而得名。汉魏鼻钮渐次变大，故亦称鼻钮为桥钮、瓦钮，见【图2】“苏城亭侯”铜印、【图3】“落索司马”铜印等。普通官员多用龟钮，见【图5】“大中大夫”铜印等。赐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多作驼钮或羊钮，见【图7】“汉叟邑长”铜印、【图18】“晋归义氏王”铜印。隋唐印章鼻钮增高，钮穿逐渐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消失，到宋元时期完全演化为长方形板状钮，见【图22】“宣毅第四十一指挥第五都朱记”铜印。明清官印中，直钮所占比重最大。为了便于把握用印，印钮逐较之宋元时期更为凸起，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后世俗称的“印把子”，见【图39】“宁川卫右千户所百户印”铜印、【图53】“镇守四川松潘等处总兵官之关防”铜印等。

官印的印文，除战国古玺外，历代官印皆以篆字为主。

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古玺的印文结构奇诡，形体富于变化，有些字颇难辨识。到了秦代，官印一改战国字体各自为政纷繁复杂的状况，以“摹印”篆相统一。“摹印”为秦书八体之一，是专用于玺印的文字。字体就是小篆稍加变化，如把小篆垂足很长的笔画截短，圆转的笔画变为方折。这些变化主要是为了适应玺印的形状。汉魏官印以“缪篆”入印，

“缪”字含有谬误之意，这种篆字受到汉代表书的影响，多不合“六书”之旨，笔势由小篆的圆匀婉转演变为屈曲缠绕，字形庄严雄浑，结构或增或损，变化多端，所以称为“缪篆”。宋代官印仍以篆书入印，但笔画曲折叠绕，形成了“九叠篆”，“叠”即一字中横画的层数。一般小篆书体，往往有疏有密，结体不易布满，因而就把篆字笔画来回弯曲盘绕，使得四面充实，均匀整齐，显示出官府衙门的庄重肃穆；此外，这种繁复重叠的印文又使人难以辨认，有防伪的作用。因此，从宋元到明清时期的官印，一直沿用九叠篆印文。由于叠篆不易识别，为防止用印时将印文颠倒，故而在钮端或印背刻上楷书“上”字，以指示用印的上下方向，见【图25】“彭州审记院信”铜印。两宋时期，九叠文中所谓的“九”是一个概数，极言其多，不一定有九叠，也可能只有五叠、七叠，而明清时期九叠文中绝大多数确有九层横画。

从隋代开始，官印有了刻款的习惯。一般在印背刻上铸印时间。与隋唐官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官印均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见【图24】“武宁第八指挥第四都朱记”铜印。南宋官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的“少府监”遂为“文思院”所取代，见【图26】“嘉定利州驻节千户左军步军第四将印”铜印。明清官印背款皆凿年款及编号，印背也都有镌刻的年款，同时在印侧刻有某字某号，见【图39】至【图54】。

此外，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多用本民族文字入印。辽、金有契丹文印，西夏有西夏文印，元有八思巴文印（如【图37】“章翊侍卫亲军百户印”铜印）。清朝则将满文与汉文都钦定为通用文字，所以官印都是满、汉两种文字并列，满文居左，右行，汉文居右，左行，见【图44】至【图54】。

在官印的使用方法上，汉魏以前的官印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随身佩带，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一是钤盖公牍上的封泥，作为行使权力的凭证。在纸张普遍用于书写之前，官府文书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简牍，文书写好之后，编排成册，在外面加覆一枚刻有方槽的木片，称之为“检”，然后用绳索把简牍捆扎起来，绳结放在方槽内，再在槽内压上特制的湿泥盖住绳结，用印章在湿泥上钤盖印文。如果一份文书用

筒较多，可以把筒牍收藏在绢囊之内，囊口用绳捆扎后再加以封緘，此即所谓“泥封”，以示保密。官印不仅用来封緘文书，某些贵重的财物也要用印封緘。此时印章多用阴文，钤在封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如【图55】至【图62】）。

到了魏晋时期，我国官文书的书写材料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公元413年，东晋豪族桓玄掌握朝政后颁发了以纸代简令，从此纸张完全取代简牍，成为国家公文的正式书写材料，官文书上的印泥封緘遂被淘汰，变成以红色颜料在文书上直接钤盖，封泥遂为朱色水印所代替。早期纸张的篇幅较小，一件公文有时需要用纸数张，公文撰成后，将所有纸张首尾相接，粘连在一起，然后加轴成卷。为防止抽换作伪，在首尾的接缝处，要骑缝加盖印章，称“骑缝制度”。这一制度，为此后各朝所沿用。唐代，公文制作完毕后，主管长官要签字画押，然后交监印官审核盖印。宋代，规定公文如有脱误，需改动者，须在改动处加盖印章。其后历朝均沿袭这一制度。明代朱元璋兴起“空印案”后，建立起半印勘合制度。所谓半印勘合，就是将盖有官印的公文纸在盖印处分开，其左右两侧各占有印章的一半，然后将右半张纸藏于内府，左半张纸交付官府诸衙署，在行文时，比照印章是否相符。其目的在于防止官吏的欺弊行为。至于回收旧印的处置，则多是斩去印的下角，或凿一“销”字，以表示废弃不用，如【图79】“安岳县劝学所之钤记”木印。

历代私印体制繁杂，形式多样，可以从字意、文字安排、制作方法、治印材料以及构成形式上划分为各种类别。以形制而言，有一面印、两面印、六面印、多面印、子母印、套印等；以印文而言，有朱文印、白文印、朱白相间印等；以内容而言，有姓名印、斋馆印、诗词印、吉语印、花押印、象形印等。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私印种类多样，下面择其要略作介绍。

两面印：普通印章只有一面，两面印则上下相对的两面都为印面。一般印体左右有孔，可以穿带，又名穿带印。印的上下两面都刻有印文，大都一面刻姓名，一面刻字号，盛行于汉代。如

【图100】“李少卿”银印。

六面印：印章六面体的六个面都为印面的称为“六面印”。立方体六面印的六个印面都为正方形。由于六面都要刻字，为避免相邻的面互相穿透，每面的边都要留得稍宽，每面的边长也不可能太短，一般适合刻较多的字。六个印面可以镌刻不同的内容，可以做到一印多用，这特别适合书画家的书画印——书画家在不同的书画作品上钤不同的印面，就可以避免重复。如【图111】“范隆”六面铜印。

套印：由大小数印套合而成的印章。套印分若干层，有多至五六层者，每层（被套合的每方印）五面都可刻印，最末一层为小方印，可刻六面。明清以后较为流行。为便于携带，套印多以铜、石、牙等制成。如【图141】和【图142】铜套印。

象形印：亦称“图案印”“肖形印”，是刻有图案印章的统称。图画入印自战国至汉魏都有，以汉代为最多。这种印或为纯图画，或为图画中附有文字。形式多样，取材广泛，有人物故事及龙、凤、虎、犬、马、鱼、鸟、“四灵”等，以古朴取胜，多为白文印。如【图128】巴蜀图语符号铜印、【图132】兔图形铜印。

人名印：这是最常见的私印，印文刻人的姓名、表字或号。如【图108】“杨廉”铜印、【图109】“韩绩”铜印、【图110】“陆烺”铜印。另有在姓名后加“启事”“白事”“言事”“再拜”“谨封”“顿首”者。此种印专用于书筒往来。如【图107】“刘京言事”铜印。

斋馆印：古人常为自己的居室、书斋命名，并常以之制成印章。如【图119】“陶斋”铜印、【图120】“简斋”玉印。

署押印：也称“花押印”，系雕刻花写姓名的押印，使人不易模仿，以之作为取信的凭记。署押印相传始于五代，宋时已较多出现，盛行于元代。传世的押印有带边和不带边两种，形状多样，以长方者为多，一般上端为楷书姓名，下端为草书或楷书押符，又称“元押”“元戳”。押印着重书趣笔意，讲究疏密，在印章史上独树一帜。见【图124】至【图127】。

词句印：又称“闲章”，由秦汉时期的吉语印演变而来。宋元以后风气颇盛，到了近代，闲章便发展

成为中国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闲章的内容十分广泛，书画家或自拟词句，或撷取格言、警句于闲章，以示对人生和艺术的感悟。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闲章，以木质为主，其内容包罗万象，粗略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类：吉语类，如【图157】“寿命延长至八千岁”、【图158】“多福多寿多男”、【图151】“吉金乐石永保年寿”、【图149】“恭则寿”、【图162】“饮且食兮寿而康”、【图164】“万福无极”、【图168】“仁者寿”、【图169】“延年益寿”、【图179】“富贵寿考”、【图175】“胡圻富贵长寿之印”、【图154】“貽福惠君”；述志寓意类，如【图163】“读有用书行无愧事”、【图166】“淑身涉世学古服官”、【图145】“虚其心实其腹”、【图170】“度身而衣量腹而食”、【图171】“诗书裕后孝友传家”、【图178】“以义理为丰年以忠恕为珍宝”、【图180】“为善最乐”、【图172】“调养怒中气隄防顺口言留心忙里错珍惜有时钱”、【图176】“作德心逸日休”；履历类，如【图165】“家在云门山里”、【图177】“云门山樵”；自嘲自赏类，如【图167】“我本薄德人宜行积德事我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图152】“才与不才”、【图153】“近来情转深”；等等。

宗教法印：系各宗教组织（如佛教或道教）模仿官府公印而成。通常以金属、玉、石和木制作，用以上章申表、发书遣文、召役鬼神、通圣达灵、驱邪治病、养身护体、延年益寿等。见【图134】至【图140】。

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印章，具有地域性和专题性两个突出特点。该馆自建馆以来，在藏品收集上，历来注意对当地文物的收集、采购，印章也概莫能外。该馆印章的来源，除极个别为发掘的出土物外，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时任馆长的闻宥先生在成都本地收购，所以这批印章多与四川本地和西南地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民族等各个方面。此外，作为一家大学博物馆，该馆学人多年来紧密围绕学校教育科研进行藏品的收集与研究，使藏品自成系列，专题特色突出。

就印章而言，可分为历代官印、封泥、清代民国时期学印、宗教法印、名章、斋馆印、肖形印、押印、闲章等数个专题。其中尤以清代民国时期学印最能体现这种地域性和专题性特点。

四川大学博物馆共收藏有与四川清代至民国年间地方教育相关的学印44枚，包括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各府州县官办的儒学所、劝学所、教育公会、学务科等各种地方教育机构的印章。除此之外，还有四川大学、四川府中学堂、四川女校、四川师范学校等近代四川官民办大、中学校的印章。通过这批印章，可以对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的教育情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清初的教育制度承袭明制，学校的主要类型是府、州、县学，地方上没有专管教育的机构，学校称作儒学所。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学生由地方官选拔，要求外表俊秀、五官端正，年满二十五岁，已经读过“四书”。学校按“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其中礼、御、书为一科，乐、射、数为另一科，分别由训导负责讲授。教授、学正、教谕以经史教育学生。学生的出路基本是通过学校推选进入国子监和参加科举。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此期的印章四枚，分别为“芦山县儒学记”铜印（清乾隆十六年）、“绵州儒学之记”铜印（清乾隆十六年）、“双流县儒学记”铜印（清乾隆十六年）、“铜梁县安居乡儒学之记”铜印（清嘉庆二十三年）。这四枚印章在材质、尺寸、钮式、印文、边款上均相同。清代官印统属礼部铸造颁发，地方上不得随意铸造。官印有统一的规格尺寸，而且制度严格，等级分明。清代的府、州、县学如知府、知州、知县是正印官，所用印为方形；他们的辅佐官叫“佐式”，使用的是长方形印，叫“条记”“图记”或“铃记”。故而地方儒学所的印章称“记”而不称“印”，以区别于“正印官”。

到了清代末期，地方上成立了专管教育的机构，即劝学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颁布《各厅州县劝学所章程》，宣布废除各府州县儒学的教授、学正、教谕及训导各署，设立劝学所。这是近代中国设州县教育行政机构之始。各州县劝学所以地方长官为监督，另设专职总董一人，综核各州县学务和劝导各地兴办学堂。各州县内划分若干学区，各区设劝学员

一人。劝学员的主要职责是宣讲“圣谕广训”和“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以达到规范教学的目的。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此期的印章20枚，分别为“下川南区省视学之图记”木印、“川东区省视学图记”木印、“南江县劝学所图记”木印、“什邡县劝学所图记”木印、“安岳县劝学所图记”木印、“绵州劝学所之图记”木印、“通江县劝学所图记”木印、“邛州劝学所之图记”木印、“资阳县劝学所图记”木印、“西昌县劝学所图记”木印、“南部县劝学所图记”木印、“古宋县劝学所图记”木印、“屏山县劝学所图记”木印、“天全州劝学所图记”木印、“眉州劝学所之图记”木印、“绵竹县劝学所图记”木印、“盐亭县劝学所图记”木印、“峨边厅劝学所图记”木印、“双流县劝学所图记”木印、“高县劝学所之图记”木印。这批印章的材质、尺寸、印文基本相同，刊刻时间均为清宣统元年（1909）。

到了宣统二年（1910），由于《地方学务章程》的颁布，劝学所与地方自治机构在行政职权的划分上发生争执，地方学务由地方自治机构办理，而劝学所为行政机构，仅有赞助、监督教育的职责，成为地方教育机关的辅助机构。县级教育管理机构的建立，是我国教育管理史上的重大进步。

民国时期地方上的教育行政机构多有变动，比较混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1912年要求各县设科以管理教育事务，但没有落实。到了1913年7月，教育部又通知各地方上暂留劝学员，设立县视学。1914年8月，教育部又呈请仍然依照清朝旧制设立劝学所。到了1924年，教育部发布了《县教育局规程》，正式规定各县设立教育局。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教育机构又多次变动，时而为局，时而改科，争论不休，多次反复，最终还是决定在地方设立教育局。

这一时期的地方教育管理机构印章有“重庆府劝学所之铃记”木印、“新繁县劝学所之图记”木印、“酆都县学务科铃记”木印、“梁山

县学务科之图记”木印、“秀山县劝学所图记”木印、“峨眉县教育公会图记”木印、“安岳县劝学所之铃记”木印、“射洪县劝学所之铃记”木印、“盐亭县劝学所之铃记”木印、“合州劝学所之铃记”木印、“绵州劝学所之铃记”木印、“大足县劝学所铃记”木印、“保宁府劝学所之铃记”木印、“东安县劝学所之铃记”木印等。其名称、形制均不甚统一，正是当时机构混乱状况的反映。

除了以上地方教育机构的印章外，四川大学博物馆还收藏有一部分新式学堂的印章，如“成都府中学堂图记”木印、“国立四川大学”木印、“四川女学校印”木印、“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关防”木印、“单级教讲演员养成所”木印、“讲演员养成所庶务处”木印、“讲演员养成所”木印等。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设立和迅速发展。新式学堂的设立，一是创办新学堂，一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有官办、公立、私立几种。以成都府中学堂为例，其前身为汉“文翁石室”。清康熙年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此基础上建锦江书院，直至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改之为成都府师范学堂，“癸卯学制”施行后又改为成都府中学堂，标志着改办新学的开始。这次改革，在学制、学习内容、教材使用、教师选择等方面都有重大变革，尤其以学生学习内容的改革为最，即由以前的《诗》《书》《易》《仪礼》《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变革为学习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其办学格局亦更接近现代中学。这一批新式学堂的创办，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次从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印中精选官私印章181方，每方印章均精心铃盖，并附精美照片，成此一书，以奉献社会，满足篆刻艺术、考古文物、古文字等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需要。笔者受学识水平所限，在印章的选择标准、行文描述、图像处理等方面难免有谬误脱漏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批评指正。